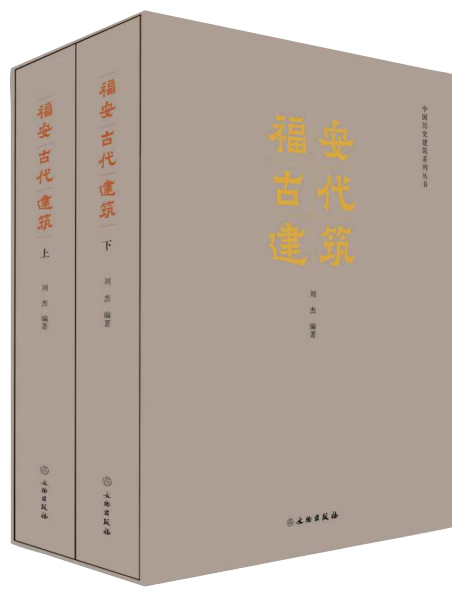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流域、移民与匠作

——《福安古代建筑》的方法论启示

李泽辉



《福安古代建筑》
刘杰编著
文物出版社2025年12月版

在中国建筑史学界，古代建筑研究长期存在一对视角矛盾：一方面，以“中国”、省域或文化圈为范围的书写易于把握宏观特征，却往往忽略内部差异与地域个性；另一方面，以单体建筑或案例群为对象的个案研究精细入微，却难以呈现系统性的历史叙事。刘杰教授的新著《福安古代建筑》试图在两者之间开辟一条新路径——以福建东北部长溪流流域核心腹地的福安（县级）市为研究地域，将数以千计、散布于山野之间的乡土建筑遗产汇聚成完整的生动叙事，从有限的地理单元内洞察个性，窥见共性。

本书的主体章节展现了一个体系化的建筑类型学梳理。从城镇与村落切入，进而依次展开民居、祠堂、宗教、文教、交通诸类型建筑研究，涵盖面之广、案例之丰，在同类地域建筑研究专著中并不多见。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系统记录了一批鲜为人知的建筑遗存，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流域建筑史”研究范式，将地理单元内移民、匠作等人文要素与建筑本体分析结合起来，将建筑史研究提升到“环境—人群—技术”互动的社会史高度。

从“县域”到“流域”：
福安地理单元的逻辑重构

“县域”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中并非惯常的分析单元。《福安古代建筑》一书表面上以历史上的（1911年以前）福安县为研究的时空范围，实则是以长溪流流域为地理逻辑的起点，将福安定位为这一流域的“核心腹地”。长溪流流域作为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其水系走向、山脉分布与交通网络共同塑造了内部的文化统一性与周边交流的节点性。作者敏锐地捕捉到其地理特殊性：“闽东浙尾，四固之地”，福安不是建筑文化的边缘终端，而是一个具有筛选、吸收与转化能力的区域枢纽。正如书中所说：“研究闽东地区长溪流流域的核心腹地——福安的古建筑发展演变，其实就是在建构闽东乃至福建古代建筑的发展史。”

这一逻辑在全书编写中得到了体现。在“城镇与村落”一章，研究没有止于形态描述，而是强调回归水系分布对城镇、聚落选址的决定性影响——韩阳城的选址、穆阳因穆水而成为“三省

八县”物资集散地等例，无不指向一个基本事实：长溪流流域的水文特征塑造了福安城乡空间的基本骨架。在建筑方面，流域水系内的技术联系亦十分明显。例如，本书的“民居建筑”一节阐述了畲族民居“孩儿撑伞”等技术特征在这一区域的表现；“佛教建筑”一节敏锐地从福安的禅寺中观察到佛殿建筑平面从单开间向多开间形制演变的重要线索，并非追求宗教建筑的史诗性描述，而是着力追问区域内社会运动对空间的塑造机理。在深耕已久的编木拱桥领域，作者提出桥梁技术的传播并非孤立的技术史现象，而与长溪流流域以银矿为代表的矿产开发等经济活动深度关联：正是银矿开采为宋代闽浙山区带来的国家资本流通，催生了编木拱桥这一高成本、高技术含量的桥梁类型在此区域的集中出现。

这种以流域为分析尺度的研究，使《福安古代建筑》超越了传统地方志的格局。它的重要启示在于：在古代中国，流域与水系是建筑文化与技艺传播中不可忽视的单元。作为千万县域单元的代表，福安因其地理特殊性成为建筑技术网络中的一颗明珠，也为其他地域单元的古建

筑研究提供了方法启示。

移民、匠作与建筑人文基底的生成

如果说“流域”构成了本书的独特视野，那么建筑背后的人文要素，则为古代建筑技术的研究注入了生命力。福安是历史上多次北方移民南迁的重要目的地。从晋代薛氏、唐代林氏、黄氏，到南宋时期大量入迁的土族，每一次移民浪潮都为福安带来了中原的营造技术、礼制观念与审美趣味。本书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并不满足于追溯建筑形式的“来源”，而是尝试解释这些外来文化如何在福安落地、变异并被重塑。

在技术史的书写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在长期田野调查中对当地匠作传统和技艺的关注。本书附录“传统营造技艺调查”中花大量篇幅记录传统木作技艺，如用材与用尺、地盘与榫架的设计、构件名物方法等。作者为我们呈现了大量匠人手绘图样、施工现场照片等内容，尤其是对于“文篙”制作方法、大木标号、图样绘制传统、榫卯类型与尺寸等内容的介绍极其珍贵，构成了一套与《营造法式》《工程做法》等官式体系相异而互补的大木作知识体系。从研究中可以看出，这套民间匠作系统并不追求做图放样的精准化，而是强调现场判断、材料统筹与师徒口传，充分体现了匠师对于材料性能、结构体系和空间尺度的理解。

尤为难得的是，作者还关注到大木营造的传统礼俗仪式并加以记录。如“下帖”“请鲁班”“扶榭”“安中梁”“压梁”等环节，以及桥梁营造中“建桥、择址、择日、挑梁、祭河、上梁、圆桥”等完整桥梁营造礼仪体系，不仅是民间“趋吉避凶”信仰的生动记录，更体现出古代社会在面对大型公共工程时建立信任、分配责任、凝聚认同的集体选择。正是因为人的存在，古建筑不再只是束之高阁的展品和生硬的技术名词，而能与当代世俗生活互动繁荣下去。

区域建筑史研究的方法启示

《福安古代建筑》以扎实的田野调查、精密的测绘图纸和跨学科的视野，完成了一个看似“地域性”，实则具有普

遍方法论意义的学术工作。书中记录的一手材料是研究福安古代建筑和传统文化遗产的珍贵档案。在研究者多关注宏大叙事的当下，在类型罗列与元素铺陈的叙事惯性之外，还有另一种历史正在山川溪流、桥梁、祠堂，以及匠人的丈篙与墨线中静静展开。此类研究的书写对象不是东京梦华，也非宫殿衙署，而是在宁静的山间小庙梁架墨书中仅留一名的木匠人，在地方文献中只存姓氏的造桥缘首。刘杰教授团队的工作，某种意义上就是在为这些不起眼的劳动者著书立传。这部书为我们提供的研究方向和启示至少有三点：

其一，在具有内生逻辑的地理单元中厘清区域建筑发展的脉络，在精细化的案例解读中完善中国建筑史的理论框架。朱启铃、梁思成、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辈学者，开创了中国建筑史研究的总体框架与方法体系，在百余年研究积累的今天，建筑史研究必然走向对更具内在逻辑的地域单元的精细化研究。那些被山脉与河流自然切割、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小区域”中，仍有广阔的地域建筑技术基因、匠作传承网络待研究发现，他们是检验、修正与丰富既有理论框架以及探索理论边界的实践者。

其二，建筑史研究仍需坚守扎实的田野调查传统。本书的出版，是刘杰教授数十年如一日行走于山川之间的田野工作的集中展示。实践表明，建筑史研究的根基始终在现场——每一处梁架的墨书、每一块石柱的题刻、每一座桥梁的营造痕迹，都是不可替代的一手史料。以一个个案解读串联起历史与空间的脉络，仍然是当代建筑史研究的必然选择。

其三，这部书并未将福安古代建筑视为封闭的地方经验，而是将地域性的材料转化为具有可比较价值的学术切片。继而可以此为借鉴，推动学术界在周边地区以及闽南、闽北、闽西乃至浙江、江西等更广大的区域内开展以“小流域建筑圈”为方法论的系列研究。

当然，任何富有原创性的研究都会留下可供争鸣的空间。这部著作所呈现的，不仅是地方建筑的类型学图谱，更是一扇窥见古代社会如何通过营造活动与经济、文化变迁互动的窗口。在这个意义上，福安不再只是一个地理坐标，而是成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建筑与社会文化互动的精致样本。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

基层传真

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特展



秦文明深刻塑造了华夏民族的精神底色，奠定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历史根基。“一统之路——秦文明的崛起特展”近日在徐州博物馆开展，设“大秦崛起”“战国称霸”“六合同风”三个单元，汇集16家文博单位的150余件精品文物，包括威武肃穆的兵马俑、工艺精湛的青铜兵器和庄重典雅的礼器玉器，承载着大秦先民开拓奋进、一统山河的磅礴气魄，全景还原秦国从边陲弱国到一统华夏的百年历程。此次展出的秦俑系1974年兵马俑发现之初的第一批出土文物，具有极高的考古价值；徐州狮子山楚王陵汉兵马俑与这批秦俑同馆展出，两大“地下军阵”跨越时空的对话成为本次展览的独特看点。

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



“吉金万里——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文明展”近日在烟台市博物馆开展，以三大地理单元串联多地文明，展出9家文博单位馆藏150件(套)文物精品，通过考古实证与艺术叙事，展现巴蜀、夜郎、古滇、西瓯等古国文明的独特创造力及其与中原文明的交融历程。展览分为“序厅”“川渝地区”“云南地区”“黔桂地区”“多元融汇(尾厅)”五个部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商代铜人面具、成都金沙遗址的商周时期铜人形器、古滇国青铜兵器、贵州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各种曲刃兵器以及广西本地的特色器物，串联起西南古国兴衰脉络，勾勒出一条早期文明交流通道，印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壮阔格局。

向往自然——
从“师法自然”到“与自然合作”

中国传统艺术是“应物象形”和“书法用笔”的结合，即通过形象和笔触的结合，以求更充分的表达。“向往自然——从‘师法自然’到‘与自然合作’”将于7月1日至9月20日在上海吴昌硕纪念馆开展，汇集吴昌硕、齐白石、张羽、洪浩、史金淞等名家作品，在空间和时间中显现形态与理念的延异，以及由此而生的方法与趣味的差异。吴昌硕与齐白石的山水与花鸟作品，体现着“师法自然”的传统；笔墨既是形式语言，也是理解自然的方式；形象既来源于观察，也承载着主体的精神投射。张羽、洪浩、史金淞等当代艺术家则在思考和处理“如何让自然参与？”问题从“形式如何成立”转移为“结构如何运作”。这些当代艺术家们的实践共同表明，“与自然合作”并非风格选择，而是一种方法论转向；艺术从再现机制转入生成机制，作品成为人、物质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三版、四版责编：续红明 王娟 李端

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伯乐相马”展

品读伯乐故事 发现闪光自我

任雪莉 岳敏静

2026年是陕西历史博物馆建成开放35周年，为迎接馆庆，丰富展览，该馆专为少年儿童策划推出了“伯乐相马：穿越千年的神奇伙伴”主题展。

策展：从儿童出发，打造活化空间

展览策展理念始终锚定一个核心点——“从儿童出发”。这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一次策展权力的让渡，摒弃了成人视角的单向灌输，转而以儿童的视角、视线、好奇心和认知节奏为尺度。在这里，展品不再是玻璃柜后的静物，故事不再是墙上的文字，而是一场可共情的探索旅程。

展览以儿童平均视线高度（约1.2米）为设计基准线，将全部展柜高度严格控制在1.8米以内——这意味着每一件展品都处于孩子无需仰头、无需踮脚的“平视友好区”，让“相马”的观察权真正交还到儿童手中。

材料语言方面秉持对儿童友好的理

念，采用钛金属，打造无污染的安全空间。最重要的是丰富的展柜形态，通柜内陈列历代相马图卷与青铜马饰，孩子视线平扫；斜面展柜倾斜放置于低矮展台之上，柜面与儿童俯视角完美契合；圆形独立柜散落于展厅中央，高度仅1.5米，每一座圆柜内置一匹传奇奇马，孩子可以环绕行走，从不同侧面观察马的肌肉线条与神态变化，每一次转身都是一次新的“相马”发现；帐形柜体以半透帐幔围合，高度仅1.2米，如“马厩小窗”，可与柜内的小型马来一次“亲密”接触。

根据展柜设置，展览灯光、投影选择都紧紧围绕“从儿童出发”的策展理念，既承载“伯乐相马”的展览主题，又为未来儿童展览的策划奠定基础。

主题：从故事开始，启发少年智慧

伯乐相马的故事流传数千年，也影响

了中国古代绘画、雕塑艺术中的马。展览以“伯乐相马”为主题，分为三个单元，从相马到绘马和塑马，从理论到实物。展览主题选择充分尊重少年儿童的心理需求，体现出知识性和趣味性，让小观众既能读懂“伯乐相马”的历史典故，又能近距离感受古代绘画和雕塑艺术中骏马的风骨和神韵。

第一单元“相马”，聚焦马的外形、毛色和神韵三方面，由形入神，体会相马智慧。通过丰富的图版讲述中国古代相马知识及其传承，结合馆藏造型各异的古代陶瓷马和金属马，尤其是重点展示部分马头等身体细节，展现良马风貌。

根据文献中记载的相马知识，从马的外貌出发，包括眼睛、面部、胸腹、蹄腿和尻部等多方面内容，总结中国古代的良马标准。相马口诀要记好：先看一张皮，再看四肢蹄，三看五官相，四看走跑姿。

除了外形之外，毛色也很重要，辨别毛色也是相马术的一种。《诗经》中的马多以毛色命名，毛色和体质有关；《唐朝名画录》记载唐玄宗时期的外国名马多以毛色命名，“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六匹随他征战疆场的战马而刻制的，也是以毛色命名的。

通过九方皋寻找良马的故事，讲述神韵在相马中的意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仅从外形特征来识别良马，容易让人陷入“按图索骥”的误区。史书记载，一个孩童根据《相马经》的记录和画样去寻找良马，结果好几年都找不到一模一样的马，由此证明“以神相马”的意义。

内容：用文物讲述，传承中华文明

相马的智慧在古代艺术作品中，以绘画和雕塑最为传神。展览选取馆藏40余件文物，展示良马风采，既有姿态万千的三彩马，还有绘画中的马，让孩子在重温古

老智慧的基础上，通过生动的文物，开启第二单元“绘马”、第三单元“塑马”的探险之旅。

相马术依据特定原则判定马匹优劣，对古代绘画也有深刻影响。古代画师画马重视骨骼的勾勒，先画骨架，再画皮肉；还要抓住马的比例和形态，以相马指导绘马，然后领悟到神，“形神兼备”才是绘马的精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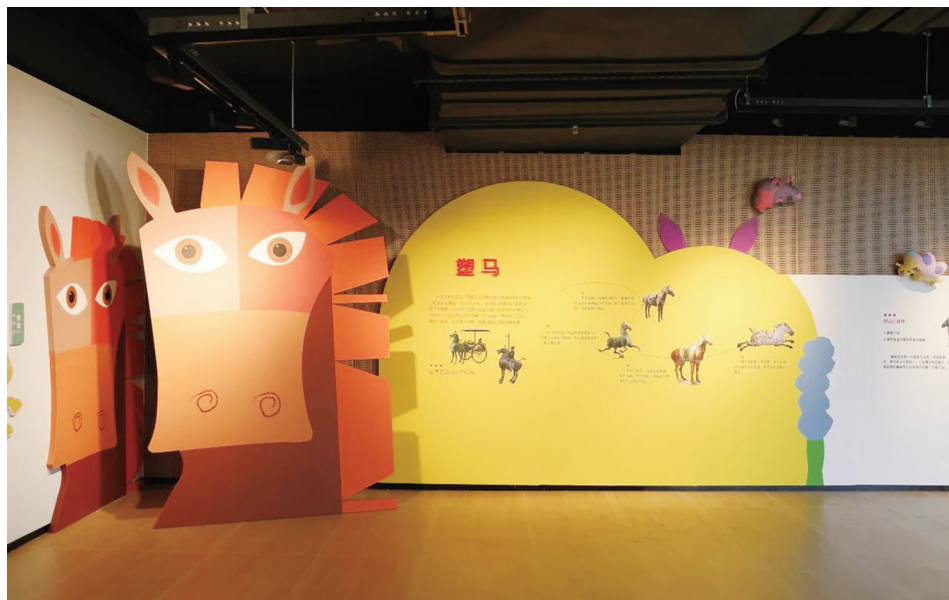
绘马中的鞍马画是重要代表。鞍马画是以马以及牵马、牧马、饮马、浴马、调马、相马等场景为主题的画作，在唐代逐渐走向成熟。在唐墓壁画和馆藏清代绘画作品中都可以看到鞍马画。通过这些珍贵的遗物，观众可以体会绘马中的相马艺术。

相较于画中之马，浑圆立体的雕塑更能展示良马的体态与神韵。公元前2世纪，西汉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石雕像，尽显政治力量与粗犷之美，是中国古代雕塑马的代表。中国古代文物艺术中，艺术家还巧借玉料、陶土、青铜、金银等材质，塑造出形态各异的立体马形象。

唐三彩马，造型饱满雄健、线条流畅、釉色绚丽，展现出大唐盛世的自信与开放。唐太宗“昭陵六骏”浮雕，作为纪念战功的纪功性雕塑，兼具写实与象征意义。唐代有21位皇帝，除献陵之外均有石马。“昭陵六骏”位于陵墓北部，武则天与唐高宗合葬的乾陵以及以后的唐陵，石马位于神道和北门外，对称排列。另外，建陵、崇陵、景陵、庄陵、端陵、贞陵、简陵，均有石天马一对。

展览以马传承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通过发挥藏品优势，展示从战国到清代的马，深化相马知识，用眼睛感受历史的温度。“人人皆是千里马，人人可做自己的伯乐”，这不仅是一次关于马的品鉴之旅，更是一堂关于“发现”的成长课，让青少年爱上历史、爱上文化。

（作者单位：陕西历史博物馆）



第三单元“塑马”